

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陪都

丁海斌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本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陪都现象。这一现象发展的中后期——唐、西夏、辽、金、元、清各朝,中国边疆地区也出现了行都、留都及分区而治型陪都等。

[关键词] 中国古代 边疆 陪都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2) 04 - 0030 - 08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其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本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陪都现象。中国古代陪都,虽多设置在中原地区,但出于边疆地区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和军事守卫等需要,亦时有陪都设置。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介绍和讨论。

本文所说的边疆地区,是现代意义的边疆地区。即在今天中国的边疆地区,古代曾经设置过哪些陪都?其基本情况如何?

一、中国古代边疆地区最早的陪都——唐代渤海国、南诏国陪都

根据笔者研究,中国古代陪都起源于商朝^①。但由于早期国家疆域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带,不太可能在今天的边疆地区设置陪都,只有在疆域扩大,今天的边疆地区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并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边疆地区的陪都才会出现。因此,目前我们所指中国边疆地区最早出现的陪都是唐代渤海国、南诏国的陪都。

(一)渤海国五京

1.概述

渤海国(698-926),是我国唐朝时期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东北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全面效法

唐朝封建文明。774年渤海国王大钦茂改元“宝历”,并以唐为模式,建立渤海五京。^②据《新唐书》记载:“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庐、显、铁、汤、荣、兴六州。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绿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暇、河二州。”^③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西京鸭绿府:今吉林省临江市;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

首都初驻旧国(今吉林敦化),742年迁至中京显德府,755年迁至上京龙泉府,785年再迁东京龙原府,794年复迁上京龙泉府。四次迁都主要在渤海国建国初期,由统治尚不稳定、自然灾害、对外关系等原因所致。当然,当某一京被作为首都后,其他京城就成为陪都了。考虑到学术界对五京的建立时间尚无统一说法。鉴于渤海国早期很可能还没有五京制,所以,渤海国基本的都城格局是:首都上京龙泉府,陪都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西京鸭绿府。这一格局只是在

[作者简介] 丁海斌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辽宁 沈阳 110036

785—794年的短暂时间内,由于迁都东京龙原府而偶有改变。

2. 渤海国建立五京制的原因

渤海国五京制的建立,基本原因有三:

第一,是在渤海诸“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的背景下建立的。也就是说,它是学习唐朝制度建立起来的。

关于渤海国五京制的承继关系,学术界多数赞同仿唐制。如孙玉良认为:“并非是渤海首创,五京制的始作俑者是唐朝,^④渤海是仿效唐朝而设。”^⑤魏国忠也认为:渤海国五京的设置“确切地说,是学习当时中原地区唐王朝五京制度的结果。”^⑥宋玉祥指出:“唐朝创制五京,渤海紧随其后,时间上的相近,吸收上的迅速,有力证明渤海五京制度是根据国内的迫切需要,积极自觉地从唐朝学习过来的。”^⑦

也有不同观点:韩国学者李万烈认为:“渤海的五京制度基于、仿效、相似于高句丽五部制。”^⑧但其说法显然不及仿唐说的根据充分。“仅就时机与时距来说,渤海的五京制度也不可能脱胎于高句丽的五部制”^⑨

至于“五京之制,始于渤海,而后来之辽金皆仿之”^⑩之类的说法,显然是早期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的产物,我们注意甄别即可。

第二,五京制的观念来源是传统的五行思想。

如魏国忠认为:“五行的思想和五方的观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战国两汉以来,就以五方的认识设置地方上的行政区划。渤海五京的建置也大体上是上述传统思想的产物。”^⑪宋玉祥认为:“渤海实行五京制度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原文化的五行观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⑫

第三,建立五京制的根本原因或曰是社会需要或曰统治吸引,即:是以多个京都来统驭不同的民族部落和地域集团,并适应不同的经济形态。后世辽、金的五京制从根本上也是基于此。五京制也就是四陪都制,就是除中心区域外,在各有特色的其他四个区域设置陪都,以作为各个区域的统治中心。五京制的作用也就在于此。

3. 渤海五京制的历史作用

第一,分民而治的工具。

渤海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兼有靺鞨各部,并有高句丽、汉族、突厥、契丹、室韦等民族在内的多

民族政权。五京制将渤海国划分为不同区域,各区域内针对本区域的民族进行不同的管理。如宋基豪认为:“五京是为统治内部的重要据点及地域设置。当然,选择据点时分明包含了压制当地种族的政治意图。”^⑬

第二,分区而治的工具。

渤海国的疆域,初限于靺鞨的部分故地,至第10代宣王大仁秀时大体上在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渤海全盛时期,以吉林为中心,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东岸,靺鞨海峡沿岸与库页岛相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是当时东北地区强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应该怎样统治和管理呢?办法就是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进行分区域管理。宋玉彬认为:“五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的完备,是渤海国政治制度封建化进程的时段性标志”^⑭

第三,交通与军事中心。

宋基豪认为:“可以确认五京曾起到对外交通路线之中心地带的作用……也可能起到了对外防御前沿基地的作用。”^⑮如:南京设在靠近新罗边境的南海府,西京设在“朝贡道”上的鸭绿府。

第四,五京可以起到文化中心的作用,特别是在学习唐朝先进文化中起到突出作用。

魏存成指出,五京仿效隋唐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这不仅说明渤海中后期制度与文化的统一,而且也反映了中原先进的制度和文化的对渤海影响的广度和深度”^⑯

如方学凤所说:五京等“随着渤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巩固,成为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统治中心,是‘海东盛国’时期的繁荣城镇”^⑰

第五,确立了后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京制样板。

渤海之五京制学自唐朝,但这种做法是渤海国在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次实行,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对攻灭渤海并积极统驭渤海地域和民族的辽帝国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说把五京固定为制度是渤海的功绩”、“辽及金的五京制是继承渤海的制度,这一点应是没有异议的”^⑱“五京及都城的建立和发展是渤海社会生

产力达到相当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渤海向唐朝积极学习的标志”。^①

总之,正如杨雨舒和蒋戎所说:“渤海国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建设和发展了五京,促进了渤海国的封建化,对渤海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渤海国五京制的形成与唐朝都城制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对唐朝东北地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唐朝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②五京制推动了渤海的发展,使其“遂为海东盛国”。

(二)南诏国诸京

1.概述

唐朝南诏国(649-902),是中国西南以乌蛮族为主,包括白蛮等族在内建立的政权,时间大致与唐朝(618-907)相始终。

公元8世纪,南诏在征服、统一河蛮地区各个部落以后,特别是云南王阁逻凤统治时期大规模建城。南诏古城比较重要的有:位于今大理地区的太和城、羊苴咩城、龙口城、龙尾城、大理城;邓川东面的邓川城;今弥渡红涯的白崖城以及今昆明的拓东城等。这些城址大多分布在山坡上,面积不大,从军事目的出发,城墙巧妙地利用山势地形修筑,这些城邑的城墙沿外侧削山坡呈直壁,平地则沿溪流而建,以利防守。南诏城邑以其性质不同,分别为:(1)王室居住的都城,如太和城、羊苴咩城;(2)近于行都的大理城;(3)陪都,如拓东城;(4)南诏王室、清平宫、大将军等居住的城堡,如百崖城;(5)拱卫都城要塞和堡垒,如龙口城、龙尾城及邓川城等。这些城邑中,曾经成为陪都的有如下所述。

2.陪都简况

(1)咙吁图城

在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北距巍山县城15公里。根据唐朝以来的史籍和元朝以后云南的各种地方志记载,南诏城好图城是1300多年以前南诏始祖细奴罗所建,古城建筑物已毁,今仅存遗址。细奴罗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统一了蒙舍川,建立大蒙国,称奇嘉王,据蒙舍诏(南诏)。细奴罗建立大蒙国后,一直归顺于唐王朝,得到唐朝的大力支持,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建都蒙舍川,在川西北咙吁图山建筑南诏国家地方政权第

一座都城。因为都城是建筑在咙吁图山上,所以都城取名为咙吁图城。元朝李京撰著的《云南志略》记载说:“蒙氏名细奴罗,城蒙舍之胧好图而都之,国号大蒙,自称奇王,云南建国称王始此。”明朝李中溪万历《云南通志》也记载说:“咙吁图城,在咙吁图山上,周围四百余丈,昔细奴罗筑此以居,遗址尚存。”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在考察游览胧好山之后,在他撰著的《徐霞客游记》一书中也说:“按一统志,咙吁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龙伽独自哀牢将其子细奴罗居其上,筑咙吁图城,自立为奇王,号蒙舍诏。”^③明朝以后的云南地方史籍都有类似以上的记载,说明咙吁图城最初为南诏始祖细奴罗所建。胧好图城修筑之后,南诏国地方政权蒙氏统治集团在这里经营了四主,即细奴罗、罗盛、盛罗皮、皮罗阁。皮罗阁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并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迁都大理太和城之后,仍把咙吁图城作为陪都,先后派其子阁罗凤和孙子凤伽异以副王的身份在这里镇守,咙吁图城在南诏国地方政权存在254年(唐贞观二十三年细奴罗建蒙舍诏至唐昭宗天复二年,即公元649-902年)中一直都是南诏的一座重要陪都。

(2)太和城(大和城)

南诏国建立前,洱海周围有许多小部落,史称“西洱河蛮”。他们为抵御其他部落的侵袭,在洱海沿岸建筑了一些城邑,其中较大的一座便是太和城。南诏在统一五诏的前一年(737)便兼并了一些“西洱河蛮”,占据了太和城。738年(739),南诏国将都城迁到太和城。太和城的建筑位于点苍山山麓的缓坡上,因当地居民称“山坡”为“和”,故也称建筑在山坡上的城为太和城。^④

自公元739年皮罗阁将南诏国都迁于此,中经阁逻凤,到公元779年,异牟寻继位后又迁都至羊苴咩城,太和城作为南诏早期首都共40年。此后,太和城就成为陪都了。

(3)拓东城

在南诏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着东西两都。西都是都城羊苴咩城,东都则是陪都拓东城。

唐时南诏为向东发展,南诏王阁罗凤亲至昆川巡视,盛赞“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即于永泰元年(765)派其子凤伽异在今昆明市中心筑造拓东城,取名拓东城。“居二诏(次于南诏

王)左镇抚”,起到“威慑步头恩收曲靖”的作用。^②并命凤伽异以南诏副王的身份,坐镇拓东城。拓东城是有准确史料记载的在今昆明市区范围内的首次建城,后拓东城在南诏统治力量的整盘布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陪都、东京。大理国时期,拓东城(称鄯阐城)地位、作用一如南诏。

拓东城是南诏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都城”,其地位仅次于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它一经建立,其在南诏国的向东向南拓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而且滇池地区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省内其他地方超前,因此,拓东城(中后期的鄯阐城)成了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又一个中心。建城初期,即成为“居贰诏”的重镇,后来又先后被正式定为“别都”、“上都”、“东京”(太和城称西京),其地位有时甚至超越南诏的都城。自凤伽异开始,历代国王都亲自巡驻拓东城。其中凤伽异、寻觉劝、劝龙盛、劝丰佑、隆舜五人均死于拓东城后才返葬滇西。

拓东城为南诏重镇,其地位后来超过阳苴咩城,因此其规模及形制应不输于阳苴咩城。因为拓东城于南诏国无比重要,且南诏王中有在此登基者,有在此驾崩者,有长期在此居住者,因此历代国王应不断对其扩建增修。拓东城内城外王宫、官署、馆驿、寺庙、善阐台一应俱全。

(4)喜洲(大厘城)

喜洲是大理坝子中较为发达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南诏时叫“大厘城”,位于大理坝子偏北白云峰下。南诏时,是与太和城、阳苴咩城齐名的陪都重镇。它在军事上北防吐蕃,也是佛教和商业贸易中心。

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右武将军梁建芳讨伐西洱河蛮来到洱海边,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写道,这里“有城郭村邑”。这个城“邑居人户尤众”,规模居三座古城之首。唐大历十四年,南诏迁都阳苴咩城以后,南诏王异牟寻在这里建造了皇宫,把王都迁来。直至南诏恢复阳苴咩为王都,大厘城就成为行宫,夏日里国王经常往来避暑。

当时众多南诏君臣和眷属长期居住大厘,南诏一代杰出国王异牟寻在大厘城成长,喜洲是大理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摇篮。有史家曾论证,“大理”一名就是从“大厘”演化而来。

总之,南诏共有4个陪都。咙吁图城和太和城

是由旧都转换而来,即留都;拓东城作为东都,有东西平衡之意,相当于中原地区东西平衡型陪都;喜洲则具有行都之意。

二、辽、金、西夏所建陪都

辽金西夏时期是我国陪都史上具有浓重民族色彩的一个阶段,该阶段的陪都现象彰显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巨大创造力,陪都的设立及建设促进了多个古代都城的发展。在带动区域经济方式的转变的历程中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一)辽朝陪都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其创建者为耶律阿保机。神册三年(918),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潢河以北正式建都城,称为皇都,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辽朝实行五京制,《辽史》载:“辽建五京:临潢,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析津、大同,故汉地。”^③辽朝五京建置的时间不一,从皇都之置,至“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④,前后达120多年的时间。辽在上京建立之后,由于上京偏在北部,对全国管理不便,故占领幽州,也称燕京,作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名为析津府),把原南京东平府(辽宁辽阳市)改为东京辽阳府。此时的契丹政权有三个统治中心,上京统治草原地区;南京统治燕云十六州东部之地;东京统治渤海国故地。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又建中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西京,管理燕云十六州西部之地。从此形成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燕都府(又称析津府,今北京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五京并立,以中京、南京、西京、东京四地为陪都。

(二)金朝陪都

金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金朝陪都因政治因素多次迁都使得陪都变更频繁,我们以金朝迁都为线索,将其陪都变化分

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金朝初期陪都因循辽朝旧制建立五京。金朝建国后,在护步答冈会战中打败辽军,随后展开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攻取五京的前后步骤是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金朝曾多次迁都,先后定都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之白城,1124-1153)、中都大兴府(今北京,1153-1215)、南京开封府(1215-1233)。在金熙宗时代,除了以会宁府为上京,改辽上京旧称临潢府为北京外,辽代的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的名号都依然存在。在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还建有金朝皇帝的宗庙、寝殿、御容殿,说明是把它们作为陪都来看待。

第二时期,首次迁都,改制旧陪都制度,增设汴京为陪都。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并改辽析津府为大兴府。同时又确定以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南京开封府,改中京(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为北京大定府,加上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总为四京,以备巡幸,海陵王又将原居上京的宗室和女真猛安、谋克人户迁至中都,以便控制。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以会宁府为上京,遂为五京。与此同时,海陵王时期又明确规定以(辽)上京为北京,辽阳府为东京,云中府为西京,开封府为南京。北京、东京、西京、南京正式被确定为陪都。

第三时期,再次迁都,四京名存实亡,增设洛阳为金中京。金朝后期,蒙古军把灭金朝作为军事目标,从金大安三年(1211)开始,蒙古军开始大肆掠夺驰骋在黄河以北地区,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蒙古军围占金首都中都城,金宣宗献贡人口财物,蒙古军才退兵。待退兵之后,金宣宗带领皇室珍宝由中都仓惶徙都汴京(今开封市),至宣宗南迁后河北各地已陷入蒙古军之手,金朝只能固守黄河、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带。“兴定元年(1217)八月,金朝将洛阳升为中京,改河南府为金昌府”,^② 洛阳是金朝末期的陪都,史书未有明确记载确认为陪都之事,但有“金中京保卫战”及金哀宗在洛阳城东城基础上营建新城等事实依据,多被学者们认定为金中京洛阳曾是金后期的陪都,洛阳为金陪都历

时 16 年。

(三)西夏陪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西夏初都灵州西平府(今宁夏灵武县),宋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迁都怀远镇(今银川),改名兴州,1033 年,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扩建宫城殿宇。1082 年,改兴庆府为中兴府,俗称东京。西夏仿宋朝东、西京之制,称兴州中兴府为东京,灵州西平府为西京。灵州西平府为西夏陪都。党项族从统万城到灵州城,又从灵州城到兴州城,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阶段性转化。^②

辽金西夏时期陪都制度具有阶段性特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辽金西夏各朝陪都普遍具有游牧民族的多京制陪都制度特点。契丹民族游牧迁徙的风俗影响着辽朝的统治方式,辽朝中央政府是一个跟随皇帝游动的行朝,辽国政治中心不在固定的京城而在游动的斡鲁朵^③中。金朝的多京制主要沿袭了辽朝旧制,西夏国设立陪都亦为维护游走征战成果。保护疆域领土,迁都及设置陪都是统治者为了要巩固他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消除分散割据的离心势力,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政权而产生的。总体而言,辽金西夏三朝的创建者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一共同属性决定了其有相同的民族根基感,而为了保证国家统治稳固又需要不断追求疆域的扩张和巩固,辽金两朝设置了达五个之多的京城是契丹这个游牧民族政权的特色之一。

第二,辽金西夏时期的陪都种类具有基本留根型和对外扩张型相结合的特点。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两元政治及游牧民族社会等特点使得其设置陪都的时候将开国故地设置为首都,征战扩大了统治范围后为了寻求领土安全的保障,即开始将部分汉族领地实现都城化管理,增强中央集权和统治的核心凝聚力,金朝沿袭辽之旧制,在建立形成陪都、迁都中都后都曾以其中一个为“大后方”,而后多由金人的征战方式决定了金统治手法多利用原有建制来统治故地,在不断的对外扩张势力范围的同时,为及时稳固统治,更换首都和陪都现象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辽金西夏时期的陪都进程具有完成了

由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的重要意义。辽金西夏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具有游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农业只有雏形,在各朝不断深入汉族地区版图以后,要统治人数众多的农耕民族,致使其分而治之,设立各都,辽朝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金国沿袭辽朝旧制,在争取经济方式融合转化的同时,存有对农耕民族的戒心,顾将游牧地区及农耕地区各自设都,将农耕民族统领于下,西夏党项族都城的迁移,从统万城到灵州城,又从灵州城到兴州城,亦是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阶段性的转化。

三、元朝陪都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溪权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②。在这广阔的领域之内,元上都既是元朝的夏都,也是欧亚大陆上最有特色的草原城市。

元代建立以后,定都大都,以上都(位于今蒙锡林郭勒盟敦达浩特东北约20公里)作为陪都,实行两都制,皇帝每年往来于大都(今北京)与上都之间。上都是忽必烈建立的,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基业。“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恒州。元初为扎拉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宪宗五年(1255),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恒东州滦水北之龙岗。中统元年(1260)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廷所在加号上都。”^③

由大都至上都共设昌平、榆林、洪赞、鹁窝、赤诚、独石口、牛群头、明安等十一个驿站。“在现存元代正书和地志书中,都记有这11个站的名称,分记在大都路与上都路之下”^④。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皇朝都实行过两都制或多都制,有的出于政治需要,有的出于经济需要,有的则出于生活方式的需要。元代的两都制,既是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上都又是元代统治者与漠北诸部联系的枢纽。

元上都开平城,是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初建,至1358年第一次被焚的百年中,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在中国古代陪都史上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第一,国际性。

因元朝统治疆域广大,元上都成为国际性都市。元上都是蒙古从草原崛起并实现全国统一的基地,是大一统的元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的国际性大都会。

第二,第二政治中心。

皇帝每年在上都驻夏时,大多数蒙古宗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觐,当时称“朝会”。皇帝在上都期间继续处理国家政务。重要的公文奏表和军情报告通过急递铺传上都。同时,皇帝还经常向全国各地发布圣旨、诏令。各行省主要官员,要定期面见皇帝,有时也参加上都朝会,讨论军国大事。历史上,元朝皇帝还在上都接见过各国来访使者。

上都作为国家的重要政治中心,发生过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新皇帝继位的忽里台(蒙古语quriltai的音译,汉译为“大朝会”)经常在这举行。继忽必烈在开平城继皇位之后,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文宗图帖睦尔、天顺帝阿剌吉八、惠宗妥欢贴睦尔都是在上都继位的。在忽里台上要举行隆重的典礼仪式,包括诸王扶新皇帝登上宝座、群臣行跪拜礼、萨满(巫师)祈福告天、上尊号等内容。同时,要宣读成吉思汗的“大札撒”(蒙古语yekeiasap的音译,意为“大法”),对先朝斡耳朵、驸马、诸王及蒙古各部领,都要进行赏赐,即位仪式结束之后,还要举行大宴庆贺。

由此可见,上都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三,夏都。

元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草原城市,更是元王朝的夏都,皇帝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大事。

第四,留根性。

上都是忽必烈入主中原前的都城,以其为陪都,具有留根性。既是怀旧,更是根据地。蒙古诸王贵族的朝会(忽立勒台)和传统的祭祀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上都是一座美丽的草原城市,它的建立和繁荣主要出于元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并没有牢固的经济基础。而对于一座城市的长期存在来说经济条件较之政治条件是更加重要的。正因为这样,一旦元代崩溃作为夏都的上都城也就是无法维持下去了。上都陷落和宫阙的残废,实际上宣告了元

代的没落。

四、清代陪都盛京、行都承德

清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一大帝国。但不同的是,它和元朝相比,统治时间长,自身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得比较好。反映到陪都设立的问题上,满学汉制,清承明制。由于清初与明处于共存及历史连续关系,所以,所谓满学汉制,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学习明制。因此,清入关后,出于历史承继关系和留根需要,为了突出盛京城的显赫地位,取法于明朝“陪京”制度——两京制,即尊其为“陪京”(亦称“陪都”、“留都”、“留京”),按照明代的制度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建立了相应的军政制度,确立了清代的“两京之制”。

陪都盛京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入关之初,满族统治者的留根意识强烈,具有一种朴素的陪都意识,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还不多。当时的有关文献多使用“留都”的名称。如《盛京通志》载:“世祖统御六合,定鼎京师,以盛京为留都。”^②又如《大清一统志》载:“世祖章皇帝统一寰宇,定鼎京师。尊盛京为留都。”^③

第二阶段是以制度建设为主的陪都建设阶段。主要是从顺治朝后期开始的。即如郑天挺先生所说“承明制”^④,明确按照两京制建设相关制度,如盛京五部、盛京内务府等。并在相应的文献中开始广泛使用“陪都”一词。(“留都”一词仍存在,也常被使用,两者并存。)此外,康熙、乾隆等10次回乡祭祖,隆重其事,郑重其事,陪都之荣宠及所得之实际利益都达到顶峰。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宫殿和城市建设、文化建设也得到了广泛展开,陪都气象日隆。特别是对努尔哈赤、皇太极在此修建的盛京皇宫及城池进行了扩建、拓新,使陪都盛京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宫殿群和一定规模的城阙。

第三阶段是到了清晚期,留根已不重要,祖宗已被淡忘,内忧外患,岂顾其他。陪都只有其壳,而无多少实际意义了。此时盛京的“陪都”规制在实际上已所剩无几,“陪都”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了。

清代陪都盛京,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民族特色的陪都之一。其兼具多民族(满、蒙古、藏、

汉)特色的宫殿、满汉兼备的珍贵文献、旗民二元管理体制、教育中的觉罗学和八旗学校等,都凸显了民族特色。

清代盛京陪都也是中国古代陪都发展史中,距今年代最近的陪都之一。因此,其遗存也较丰富,并由此成就了今天沈阳的历史文化名城辉煌。

除盛京外,清朝有京城之名的还有“天眷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及无名有实的夏季行都承德等。

赫图阿拉是后金政权都城。又名兴京、黑图阿拉、赫图阿喇或黑秃阿喇,满语“横岗”之意。故址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永陵公社之老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清太祖)始建城堡于此。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定都于此。天命六年(1621),迁都至辽阳。天聪八年(1634),尊为兴京。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东京城设留守章京。这两个后金都城在弃用后,都保持了京城的名称,满族统治者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但它们不存在实质性的都城含义,也不能算得上陪都。

与“天眷兴京”赫图阿拉和东京辽阳等有名无实不同,承德避暑山庄则是有实无名的清代“行在”、“夏都”、“塞外京都”、“第二个政治中心”。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一座夏宫。魏源曾言道:“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最盛”^⑤。

避暑山庄兴建后的大约一百年间,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进行木兰秋狝。康乾时期,皇帝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康熙曾写到:在此“日理万机,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⑥。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更具实质意义的陪都和政治中心。但它在清代文献上并没有陪都之名,只被称为承德离宫、热河行宫或行在。这和它除宫殿和寺庙建筑外,并没有合乎规格的城池,不具备其他都城功能有关,它是一种别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特殊类型的陪都。

总之,从中国古代中、后期开始,陪都现象扩展到了边疆地区。这些边疆地区的陪都或为边疆

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南诏、西夏、辽、金)所建,或为少数民族执政的中央政权所建,地域上则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南地区,皆具有突出的少数民族特色,是中国古代陪都现象中值得特殊关注的部分。

[注 释]

① 参见笔者在《社会科学战线》、《辽宁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② 关于渤海五京的建立时间,学者们有分歧。许多学者认为五京制建立在文王大钦茂时期,即8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见魏国忠:《东北亚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页;[韩]宋基豪:《渤海五京制的渊源和作用》,载《渤海史研究》9,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本书采用的时间源于魏国忠等著《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也有的学者持有其他观点,如晓辰《也谈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一文认为:“金毓黻先生把渤海五京及州府名称整齐厘定的年代推归在渤海十一世王太仁秀之时还是比较审慎的”等。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2页。

④ 需要说明的是,五京制并非唐代始创。五都制肇始于战国时代,据《战国策燕策一》所载,齐国除国都临淄外,还在四境设有平陆、高唐、即墨、莒四个别都,故时有“五都”的说法。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五都制,三国曹魏沿袭其制,黄初二年(221),曹魏在首都洛阳外,又设有长安、谯、许昌、邺四都。

⑤ 孙玉良:《渤海迁都浅议》,《北方论丛》1983年第3期。

⑥⑪ 魏国忠:《唐代渤海五京制度考》,《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3期。

⑦⑨⑫ 宋玉祥:《略谈渤海五京制度的渊源》,《渤海上京文荟》总第10期。

⑧ [韩]李万烈撰,黄有福译:《渤海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民族史译文集》1985年第13期。

⑩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289页。

⑬⑮⑯ [韩]宋基豪:《渤海五京制的渊源和作用》,载《渤海史研究》9,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第226页,第231-232、240页。

⑭ 宋玉彬:《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东北史地》

2008年第6期。

⑰ 魏存成:《渤海城址的发现与分期》,《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

⑱ 方学凤:《渤海城镇浅议》,《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⑲ 方学凤:《渤海城镇浅议》,《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⑳ 杨雨舒、蒋戎:《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㉑ [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1页。

㉒ 史念海先生等称之为“大和城”,见《中国都城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等。

㉓ 《南诏德化碑》(现立于大理市距下关7公里的苍山佛顶峰下,滇藏公路西侧1公里的太和城宫门外)。

㉔ (元)脱脱等:《辽史》卷36《兵卫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7页。

㉕ (元)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页。

㉖ 刘典立总编:《洛阳大典》,济南:黄河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㉗ 吴峰云、杨秀山:《探寻西夏文明》,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㉘ 斡鲁朵制度:斡鲁朵,辽宫帐名。《辽史·营卫志上》谓:“宫曰斡鲁朵。”契丹是游牧民族,其君长习于帐居野处,车马为家,转徙随时,无城廓沟池宫室之固。故其宫帐之组成、管理、警卫与供给都有与之适应的特有制度。

㉙③⑩ (明)宋濂等:《元史》卷58《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345页,第1349-1350页。

③⑪ 《永乐大典》卷19422《析津志辑佚》,第124页。

③⑫ (清)阿桂等:《盛京通志》(乾隆武英殿刻本)上,卷23《建置沿革》,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380-381页。

③⑬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页。

③⑭ 郑天挺:《清史探微》载《明清的“两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132页。

③⑮ (清)魏源:《圣武记》卷3《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0页。

③⑯ 康熙御制穹览寺碑文。

责任编辑:祝立业